

漩涡的契约：论“有用”通往“值得”的城市发生机制

城市的存续力量不在有用本身，而在有用内部的异质互动能否结晶为一种非功能性的形式；形式再反过来吸附新的异质承载者，形成正反馈循环。

蔡彦 著 · 之一 · 城市发生学 · 发表于2026年7月29日 · 约 2.3 万字 · 预备学员首发

摘要

为什么大量功能完善、指标健康的城市持续失去人口，而许多功能残缺的街区反而维持惊人的韧性？本文提出，城市的存续力量不在于“有用”本身，而在于有用内部的异质性互动能否结晶为一种非功能性的“形式”——一种可被识别、记忆、传递的共同生活形状。这种形式不是有用的附加层，而是有用的副产品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反客为主：它从日常功利的缝隙中被挤出，随后反过来吸附新的、异质的有用，形成正反馈循环。本文论证，这一循环的启动不取决于有用的总量，而取决于有用内部的“共同承载”——一群不同来源的人必须在对具体难题的反复摩擦中，把彼此的存在从“可替换的工具”变为“跟谁一起扛”的特定面孔。形式正是在这种面孔化的过程中诞生的。通过分析聚落起源中仪式如何将功能分配嵌入叙事结构、有用如何在共同承载中发生内部跃迁、形式如何从功利互动的缝隙中结晶，本文构建了有用→形式→新有用的循环模型。以苏荷区、曼彻斯特、鲁尔区为经验参照，本文展示这一循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运行、失效与修复条件，并通过与场景理论、地方依恋研究、集聚经济理论的严格对话，确立“形式”概念的不可还原性。结论指出，城市规划的重心应从“如何让城市更有用”转向“如何不掐断有用的共同承载”，并给出可操作的证伪条件。

关键词

城市韧性；形式生成；共同承载；有用与值得；循环机制

一、引言：一个需要解释的不对称

观察城市史，会发现一组反复出现的事实。

某些城市功能完善、指标健康——就业率稳定、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正常运转——却持续失去年轻人口。离开的人并不抱怨。他们会说“这个城市挺好的”，只是不肯把人生中超过工具性必要限度的部分放在这里。工作在此，生活在他处；赚钱在此，做梦在他处。

与此同时，另一些城市或街区在某一时期身陷衰败：产业撤离，基础设施老化，部分功能已经残缺。但它们持续吸附着新的涌入者。不是被迫留下的人，而是主动涌来的人——涌向纽约苏荷区废弃的铸铁厂房，涌向柏林围墙倒塌后东边那些取暖都成问题的空楼，涌向深圳华强北那些连营业执照都不齐全的档口。这些地方不提供稳定的就业承诺，按常规标准甚至“不宜居”。但涌入者不把这笔账算成经济损益。他们用另一种语言描述自己的选择：气味、氛围、生机、可能性。

这两个方向的证据指向同一个问题：在“有用”与“让人愿意留下”之间，存在一种尚待清晰分析的关系。有用解决的是生活难题——就业、住房、医疗、安全。一个理性行动者选择定居于某地，有用的权重占据优先地位。但“让人愿意留下”不同。它指的是一个地方的不可替代性——不是因为去别处就活不下去，而是因为别处就是“不对”。两个就业率、交通便利度、房价水平相当的城市，可能一个让人愿意留下，另一个只让人觉得“还行”。“还行”的城市，人口在停滞中老化；让人愿意留下的城市，人口在流动中再生。

既有研究已经在不同方向上触碰到这个缺口。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Jacobs, 1961）中描述了街道生活的活力——短街区、混合用途、老建筑、高密度——但她始终将这种活力论证为服务于安全与社区凝聚力的机制。雅各布斯揭示了混合用途比单一用途更好用，但没有追问：为什么有些同样混合用途的街道，仍然让人不想停留？她把“街道芭蕾”翻译回了功能的等价物——它让街道更安全，让邻里更互助。这个论证是强大的，但它绕过了那个更棘手的问题：芭蕾本身，那种让人单纯愿意待在那里、不为任何特定目的浪费时间的品质，是否具有独立于功能的意义？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Lefebvre, 1974）比雅各布斯走得更远。他区分了空间实践与表征的空间：前者是功能性的、被规划组织起来的，后者是诗性的、被日常生活浸润的。列斐伏尔坚持，表征的空间不能被还原为空间实践的副产品。但列斐伏尔的理论有一个本文不能继承的预设：表征的空间在他那里是功能空间的辩证对立面，是抵抗的场所，是阶级斗争的阵地。这使他的理论在面对一个更朴素的问题时失去了解释力：并非所有让人眷恋的城市空间都承载着政治抵抗。一个城中村巷口的棋摊，它的“美”并不来自对资本逻辑的自觉反抗，而仅仅来自一群人在日复一日的共处中自己形成的那些多余的、非功利的互动方式。本文需要在列斐伏尔已经触达的界面上，放下他的政治哲学荷载，重新追问：形式究竟是如何从有用的内部、而非从有用的对立面，被发生出来的？[1]

城市经济学传统提供了另一组必要的对话对象。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Glaeser, 2011）中将城市的文化魅力纳入经济分析，论证了“消费城市”的兴起——人们不仅为工作机会迁徙，也为餐馆、剧院、有魅力的街景迁徙。这一论证把“美”领进了经济学的正门，但它的处理方式有一个内置的限度：美必须被操作化为可以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咖啡馆密度、文化场所数量、创意阶层占比。经济学不处理那个不可被指标化的剩余：那个让一个刚下火车的人在某个街区感到被什么攫住了、却完全说不上来的东西。这不是经济学做得不够好，而是那套范式的方法论边界恰好切过了本文试图进入的领域。在它可以量化的区间内，它只看到有用以消费形态的延伸；值得作为一个不可被还原为有用总和的层面，不在它的光学范围内。[2]

都市社会学和文化地理学中还有一个更贴近本文论域的传统：地方依恋与地方感研究（Relph, 1976; Tuan, 1977; Altman & Low, 1992）、场景理论（Clark, 2014; Silver & Clark, 2016）、城市韧性的系统研究（Meerow, Newell & Stults, 2016）。这些传统在各自层面都承认了城市在功能维度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化约的经验维度。但本文将论证，它们未能处理一个关键的发生学问题：那种不可化约的经验维度，是如何从功能的缝隙中第一次被生产出来的？地方依恋研究擅于识别依恋的存在与否，但不擅于解释它如何发生；场景理论将城市魅力分解为可测量的维度，但分解之后，那个让所有维度共同生效的“有机整体性”反而被遗失了；城市韧性研究关注系统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但尚未深入到那种“内生性的新陈代谢能力”从何而来的问题。

本文试图直接回答这一问题。核心判断是：城市真正的存续力量不在于有用本身，而在于有用内部的异质性互动——一群来自不同来路、携带不同难题的人，在对具体生存问题的反复摩擦中——能否把彼此的存在从“可替换的工具”变为“特定的人”，并在这个过程中共同生产出一种非功能性的形式。这种形式一旦形成，它就不再是“一批功能产生的效果”，而是一个独立的吸引子——它反过来把新的、携带未成形有用的外来者拉进这片互动的场域，开启新一轮循环。这个循环一旦启动，城市就不再依赖任何单一产业的持续性。它能承受单个产业的衰败，因为它的形式还在吸附着下一轮的有用，而有用的新形态会找到自己的新产业。

以下论证按六个板块展开。第二部分从聚落起源入手，论证有用与值得从一开始就被编织为互惠结构，仪式等功能之外的集体活动扮演了“共同承载的初期凝结剂”的角色。第三部分重新处理“有用”的内部跃迁，不把“谋生手段”与“生活地基”当作给定的分类格，而是展示这一分化如何从城市的具体历史矛盾中被逼出来。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核心机制：论述形式如何从有用的“共同承载”中被发生出来，并以一个微观案例详细打开这个结晶过程。第五部分给出完整的循环模型：共同承载→形式生成→吸附异质性新有用→循环闭合，以及两种断裂形态。第六部分以苏荷区、曼彻斯特、鲁尔区为经验案例展示模型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异化结算，并正面处理曼彻斯特音乐场景这一最棘手的反例。第七部分与场景理论、地方依恋研究、集聚经济理论进行严格对话，通过给出二维辨别网格确立“形式”概念的不可还原性。第八部分为结论，总结理论贡献，就城市规划的可能推论做最低限度延伸，并给出可操作的证伪条件。

二、聚落的源代码：有用与值得的最初编织

追问一座城市为什么不死，最稳妥的办法是退到它出生的那一刻，看它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同时期的聚落那样在热闹后悄然散掉。这一步追问往往会遇到一副标准答案：地理位置。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上，适合耕种的土壤绵延数百公里，最早的城邦只出现在少数几个点。黄河中下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散布着数千处聚落，只有极少数最终生长出城墙、文字与跨区域贸易。地理条件提供的是可能性空间，不是选择本身。是什么在可能性空间中的某一个点上，触发了从“营地为生”到“定居为城”的相变？

一种考古学上可及的回答是功能性的：这里有别处没有的资源——终年不竭的泉水，容易防御的台地，两条贸易路线的交汇口。这些都真实，但它们描述的是聚落为何能够存活，而不是聚落为何能够长成一个“地方”。存活只需要持续的物资输入；长成地方需要人把一个空间坐标织进自己的人生叙事里。

这里必须引入那个通常不被当作核心变量的因素：非功能性的集体活动——仪式、叙事和过剩的共处。

最早的聚落中心几乎全部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物资分配节点，也是集会场所。新石器时代的环壕聚落，壕沟内的中心位置往往同时坐落着最大的粮窖和祭坛。粮食分配解决的是有用——谁分到多少、什么时候分；但分配规则需要一个超越个人算计的来源来赋予权威，于是仪式出场。仪式把分配行为从赤裸裸的生存博弈中抽离，赋予一套叙事：我们聚在这里，不是因为各自害怕饿死，而是因为我们分享同一群祖先的庇护，回应同一个神明的要求。

这个叙事在功能上什么也没有增加。收成并不会因为祭祀而增多。但恰恰是这种“什么也没有增加”的东西，改变了所有人对自己身处之地的感受。原先，这片河湾只是一块提供水源和可耕作土壤的物理空间；现在，它是祖先曾经降临、神明持续注视的地方。这不是有用的升级——这是值得的初次成形：一个地方开始让人在生存压力之外，多待一会儿。

多待一会儿的后果是深远的。人在多待的那一会儿里交换并非生存必需的故事和信息，在仪式结束后多喝一碗酒，在篝火边多跳一圈舞。这些行为不会写入早期聚落的物质遗存——考古学家能挖到粮窖的坑和祭坛的柱洞，挖不到那多喝的一碗酒。但就是这碗酒，孵化出了聚落的“黏性”：一个人下次再来，不只是因为这里有水，还因为这里有一个他聊过天的人，有一件他想确认的传闻，有一首他上次没学完的歌。聚落开始有回头客。回头客意味着持续的互动，持续互动意味着信任网络的缓慢生成，信任网络一旦生成，远距离的、非即时结算的交易就变得可能。贸易的真实起源，不是两个理性经济人碰巧在河边交换物资，而是一群被共同的叙事、闲聊、歌攥在同一个地方的熟人，逐渐可以在没有当场对等支付的情况下彼此欠一个人情。

这里必须立刻堵住一种可能的误读。我并非在暗示早期聚落因为有了仪式而拥有某种“本真的完整性”，后来的城市因为功能理性而偏离了它。仪式从来不是纯粹的黏合剂——它同样是排斥与暴力的场域。谁被允许参加仪式？谁被排除在外？谁在仪式中被献祭——无论是字面上的还是象征意义上的？人类学和考古学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早期聚落的仪式生活同时生产着凝聚与区隔、庇护与暴力。本文的论点不是“仪式让聚落更美好”，而是更冷的一种说法：仪式——包括它内在的政治性与排斥性——在功能的分配系统之外，叠加了一层独立的叙事结构。这层结构使得人与地点之间的纽带，不再仅由“这里提供什么资源”的单一线索维系。一旦叙事的线也缠了上去，剪断它就需要更大的外力。有用是单线联结——资源断了，联结就断。叙事是多线联结——其中一根线断了，还有别的线扯着。

这不只是推测。人类学关于狩猎采集社会的营地忠诚研究反复确认了一件事：当一群人把一个地点用作反复举行集体仪式的场所，他们对这个地点的依附程度会显著上升，即便这个地点的资源产出效率低于周边其他可用地点。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与特定水坑、岩画点的关系的人种学记录提供了类似证据：那些被赋予叙事意义的地点——梦创时代祖先经过的地方、某个图腾的发源地——即使在水源枯竭之后，群体也不会立即放弃，而会在周边更艰难地寻找替代水源。这群人不是在非理性地行事；他们是把叙事赋予的附着算进了自己的长期生存策略里——在一个资源波动频繁的环境中，对一个地方的深层依附提供的不是即时收益，而是长期风险对冲。[3]

如果以上论证成立，聚落的起源就不该被理解为“人类首先为了生存而聚居，然后逐渐发展出文化”，而应当被重新表述为：人类可以为了生存而聚居在任何一个具备足够功能的地点；但只有那个在生存之外还发生了第一批多余的叙事、多余的共处、多余的形式的地方，才会把短期的聚居凝结成长期的定居，把空间变成地方。有用是聚的必要条件，这多出来的那层东西是安的充分条件。从聚到安，是城市被真正“发生”出来的那一步。

这个起源分析打开了一个被主流城市研究长期遮蔽的视角。城市规划理论和城市经济学在讨论城市起源时，习惯把非功能性的因素归入“文化的软性装饰”一栏，认为是可以事后追加的、无法进入核心模型的东西。但聚落的源代码显示的是相反的序列：不是先有功能完善的城市，然后人们逐渐为它注入了意义；而是在城市还远远谈不上功能完善的时候，非功能性的形式已经产生了，并且在某种

意义上，是这些形式率先把一群人“绑”在了这个地点上，从而为后续的功能完善提供了稳定的人口基础。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Mumford, 1961）中曾敏锐地指出，城市最初不是作为定居的经济方案出现的，而是作为“磁体”——作为朝圣和集会的场所，先有了磁体的吸引力，而后才有了“容器”的存储功能。本文接续他的直觉，但要把这个直觉从文明起源的序章推到城市生命历程的全程：不是只有原始聚落需要磁体，每一座城市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必须重新生产自己的磁体——否则它就会从地方退化为据点。[4]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如果形式从一开始就被编织进了有用的内部，那么在现代城市中，这一编织机制究竟如何运作？有用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内部状态，才能把那层多余的形式逼出来？这需要进入有用的内部结构来看。

三、有用的内部张力：从可替换到不可替换

上一节论证了有用与形式的共生关系构成了聚落的源代码。但“有用”本身不是一个均匀连续的量——它在不同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内部结构。只有把这种内部差异标定清楚，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城市的功能高度发达却无法维持循环，而另一些城市在功能残缺时反而能维持凝聚。

让我们从城市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类现象入手。一座资源型城市因为矿山而兴。最初十年，人口曲线陡峭上升。然后，最多三十年，问题开始出现。不是矿挖完了，而是矿工的子女到了上中学的年纪，他们发现本地的学校不行；矿工的妻子需要看病，本地的医院只能处理工伤，处理不了妇科；矿工本人的腰椎在井下干了十五年后出了问题，本地没有康复机构。在这一阶段，城市仍然提供就业——矿山还在开采，工资还在发——但它的有用已经跟不上人正常活下去所需要的那个厚度了。于是第一批走的人不是工人本人，是他们的孩子。孩子去省会读大学，不再回来。妻子说去城里看病方便，把家也搬过去。矿工独自留下，等到退休，卖掉房子，也走了。曲线从陡升转为平台，再从平台缓缓下滑。矿山还在，城市死了。

这个滑落过程，罪责不在矿山枯竭。矿山从始至终只是一个就业工具。真正发生的事，是这座因矿而生的聚落从未在有用的内部长出另一种质地的东西——不是更多的就业岗位，而是一套让人在不同生命阶段、不同处境下都能在这里找到相应支撑的能力。这套能力不能被简单归纳为“生活服务设施齐全”。一个被规划出来的、功能完善的新城，可能拥有从幼儿园到三甲医院的完整配套，但它仍然可能不拥有这种能力。因为这种能力的核心不在于“被提供的服务的种类”，而在于提供服务的方式是否把接收者从“可替换的个体”嵌入了“特定关系中的主体”。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的分野。有用的第一种形态，可以称为“可替换的有用”：它解决的是普遍化的需求——一个人需要一份工作、一个住处、基本的医疗保障。在这种形态下，服务的提供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是可替换的。你去任何一家银行开户、在任何一家医院挂号、在任何一家房产中介签合同，对方是谁不重要，只要服务本身到位。可替换的有用是城市功能的基础——没有它，城市的规模化运转就无从谈起。但它有一个内置的特征：它不产生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黏性。一座完全由可替换的有用构成的城市，在功能上是充分的，在关系上是不留人的。居民不是市民，而是用户。用户没有忠诚。

有用的第二种形态，可以称为“不可替换的有用”：它同样是功能性的——它也解决问题、提供服务——但在这个过程中，服务的提供者和接收者之间发生了特定的、不可被随机替代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通常是因为服务的过程触碰到了一些无法被标准化的需求：不是“我需要找个人修水管”，而是“我需要一个人信得过、知道我家里情况、在我不在家时也肯帮我收快递的人来修”。当一群人在一个地方生活得足够久、交互得足够密，这种不可替换的、把“某个人”嵌入“某个特定关系”的功能网络就会缓慢地长出来。它不是被规划的，是被反复的特定互助逼出来的。

城市研究的文献中以不同方式触及了这一分野。雅各布斯的“街道眼”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有“眼睛”在那里——摄像头也有眼睛——而是因为那些眼睛的主人认识街上的孩子，知道谁是新来的，会在必要时干预。这种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日复一日在杂货店、人行道、小公园里无数次非正式交互沉淀下来的。同样，森提出的“可行能力”（Sen, 1999）虽然聚焦于个体的实质自由，但他的论证蕴含着一个前提：自由不是抽象的权利清单，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安排中兑现的。一个人能否真正“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在的具体社会网络是否允许他摆脱旧身份的压迫、尝试新的角色。本文将此称为“拆锁”——一座城市拆除那些不是靠个人努力就能摆脱的、由出身地和旧社群强加的锁链的能力。一个流动到大城市的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职业选择——这是可行能力的扩展；但在此之前，他首先需要这座城市允许他不必带着“某某村某某家的老二”这个标签来使用这些选择。拆锁不创造新选项，它拆除的是阻碍一个人看见选项的旧框架。[5]

“拆锁”在运作逻辑上仍然是功能性的：它解决问题，消除痛苦，解除压迫。一个年轻人逃离家乡的宗族束缚，在大城市获得了匿名性——这是拆锁在起作用。但他是否因此对这座城市产生依附？不一定。他可能单纯把这里当成一个避风港，心存感激，但毫无情感投入。拆锁是有用的最深形态，但它仍然在有用的范畴之内：它的逻辑是消除压迫，而非创造归属。把它归于有用而非形式，是为了守住一个分析边界：形式不是从拆锁中自动长出来的。拆锁释放了人，释出了心力，释出了异质性——但心力被释出之后往哪个方向投注，异质性被释出之后能否被编织进新的互动网络，这些是下一个阶段的事。有用推到极致，不是必然变成形式。两座同样具备“拆锁”能力的城市，仍然可能是在否生成形式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这个分歧怎么解释？关键在于，拆锁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提供解决方案”的逻辑——它为个体的困境提供出路。但“出路”不等于“目的地”。一个人可能在这里解决了旧身份的压迫，但他还没把这里当成他新故事的舞台。只有当一群有着不同困境、不同来路、不同能力的人，不只是被城市“服务”，而是彼此开始共同面对某些具体的、持续的难题时，不可替换的有用才会从中被逼出来。一群人一起扛过几件事之后，他们彼此就不再是“可替换的同行者”，而变成了“特定的、跟别人不一样的那几个”——面孔化发生了。麻烦的共同承载，是不可替换的土壤；不可替换的关系，是形式诞生的前夜。这就引出了下一部分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形式究竟是如何从这种共同承载中被发生出来的。

四、形式的生成：从共同承载到结晶

在进入循环的整体模型之前，必须处理一个最容易被误会的关节。前面一直在说“形式从有用的内部被逼出来”——这些表述可能被误解为某种有用的优先发生序列：先把有用做足，形式水到渠成。这是一种危险的线性简化。

形式从来不跟在有用的后面。它不是有用完成之后的“再加一点什么”。这种加法的想象，正是那些“功能完善之后再做美化”的城市更新策略反复失败的原因：铺了花岗岩人行道，种了景观乔木，设计了统一风格的店面招牌，甚至安排了街头钢琴和周末市集，该冷清的街区依然冷清。为什么？因为那种“美”是贴上去的，它不是从这条街上真实生活的内部结晶出来的。它像一个陌生人硬塞过来的礼物，收下的人礼貌微笑，心里毫无波动。

形式要生成，需要一个在发生学上更精确的条件：一群人必须共同承载过一些具体的、需要反复协调的难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彼此从匿名的功能提供者-接收者，变成了特定的、不可替代的面孔。这不是一个比喻。可以用一个微观案例慢慢打开这个转化过程。

茶档：一个形式诞生的微型解剖

一个靠近港口的工人聚居区，街角有一家通宵开的茶档。它的目标很朴素：给凌晨收工的码头工人提供热食。价格要便宜，碳水要够，茶要浓。这是纯功能性的起点——有用。

工人每天凌晨四点钟收工，三三两两钻进同一家茶档。他们来，是因为这里近、便宜、分量。最初，他们彼此不交谈。每张桌子都是孤岛，吃完了付钱走人。这是第一阶段：纯功能交互。

但有一件事打破了这种纯功能状态。茶档只有五张桌子，凌晨四点是高峰期，通常有十五到二十个工人同时涌进来。他们不得不拼桌。拼桌这件事在功能上是负面的——它降低了舒适度。但它在社会性上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后果：不认识的人被迫面对面坐着，中间只隔一碗热汤的距离。一开始是尴尬的沉默。过了一阵，有人为了打破尴尬，对对面说了一句：“今天的汤比昨天咸。”这不是一次有效的意见反馈——他并没有去找老板投诉的意思。这只是一次伸出触角的尝试。对面的人接住了：“咸点好，出汗。”

这个对话在功能上毫无意义。两个人都知道汤的咸度不是他们能决定的，老板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对话而调整配方。但恰恰是这种“无用的对话”，完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两个人从彼此的一天中的匿名景观，变成了可以互打招呼的对象。下一次再拼桌，他们不用再经历沉默的尴尬。他们有了一个起点：“哎，今天的汤怎么样？”

这是形式诞生的第一块基石：一个共享的、微小的、非功能的参照点。这个参照点的关键特征在于，它是“他们的”——它来自他们共同经历的一个具体情境，外人无法参与，也不理解为什么这点小事值得反复拿来开玩笑。但正是这种“外人不懂”，构成了这个小群体内部的识别码。从这里开始，一连串不可逆的小步骤渐次发生。

第二步：切口与名字。经过若干次拼桌、闲聊、互相借火之后，这个小群体内部开始出现一套特定的语言。经常抱怨汤咸的那个人，被人叫做“咸哥”。这个外号不是他起的，是别人安在他头上的；他接受了。在接受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份在这个小空间里被重新定义了——他不再是一个“在某码头扛包的工人”，他是“咸哥”。这个名字不具备任何职业描述力，但它完美地定义了“在这间茶档里，他是谁”。切口也随之出现。某个工头脾气暴，每次开工骂人之前会先摸三下安全帽。这个细节被某个工友发现了，在茶档里学给大家看。从此，“摸三下”变成了这个小群体内部的一句暗语，用来预警任何即将爆发的坏消息：“老板今天摸了三下。”新来的人完全听不懂。

第三步：互助溢出。切口和名字是在言语层面的非功能形式。但它们很快就溢出了言语，开始改变这群人的功能性互动。有一天，咸哥没来。别人问了一句：“咸哥呢？”有人接话说他家里小孩发

烧。茶档里的对话从“今天怎么没来”，慢慢滑到了“他家住哪里”“谁顺路去看一眼”。这不是一次有组织的互助行动，没有人发起募捐，没有人成立互助会。它只是发生在几句话之间的一次自然滑动——从关心的切口，滑到了行动。而这种滑动的起点，恰恰是那个“咸哥”这个名字。如果没有这个名字，如果他只是“每天坐在角落的那个工友”，他的缺席可能不会被注意到，或者即便被注意到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行动。名字在这件事里的功能是：它让一个人的存在变成了可被注意的、特定化的。一个匿名的人缺席了，没人发现；一个特定的人缺席了，会有人看过去。

第四步：反客为主。到了这个阶段，人们来茶档的动力已经发生了质变。他们来，当然还因为这里的茶便宜、分量大。但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拿得到自己那个用了很多年的外号，才遇到那个能接住自己所有陈年笑话的人，才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被替换的扛包工人”，而是“这群人里的这个家伙”。有用的副产品——那个在一开始完全是被迫拼桌挤出来的、无用的对话——已经凝成了形式。形式反客为主了。茶档从一个解决温饱的工具，变成了一个让人感觉自己完整的地方。

这个微观案例的目的是打开“形式生成”的黑箱。在它从第一步到第四步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环节是某个人“策划”或“设计”的。每一步都是在上一步积累的特定性上，被偶然的互动推出来的。但这个过程的发生依赖于一个关键的结构条件：这群人必须持续地、面对面地在同一个空间里，共同处理一些具体的生活问题。不是一同“消费”这个空间，而是一同“扛”这个空间里每天的琐碎麻烦。汤太咸是一个麻烦——它让人吃得不舒服。这个麻烦本来可以各自消化掉：每个人在心里抱怨一句，吃完走人。但他们没有各自消化，而是把它扔到了拼桌的桌面上，让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共同调侃的东西。这个动作，是把私人麻烦变成公共承载的那一下。形式不是从舒适中长出来的，是从具体的、小的、共同扛着的麻烦中长出来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限定。不是所有高密度互动都生成形式。同样高密度、长期凝结的互动，完全可能生成排他性的规范或压迫性的小团体共识——青少年帮派的领地、某些封闭行业的师徒垄断。是什么决定了凝结的方向？

决凝方向的关键变量不在凝结的强度本身，而在凝结的人群是否具有来源上的异质性。港口的工人茶档之所以最终长出了具有吸附力的形式，不仅仅因为工人们之间的互动频繁，还因为这个茶档在空间上嵌在港口与民居的交界处，工人妻子、孩子、街角修鞋的师傅、偶尔路过歇脚的船客，都可能被卷进这个互动场。来源的异质性制造了持续的低度摩擦，摩擦逼出了协商的必要，协商的重复执行就凝出了规则、切口、名字——也就是形式。反之，如果一个茶档的服务对象在职业、代际、来源上都高度同质，它的互动密度也许更高，但凝结的方向会走向内部加密：切口越来越精微、仪式越来越内卷、对外来者的排斥越来越严格。这就是同一机制在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分歧：高异质性的凝结倾向于溢出开放的、具有对外吸附力的形式；低异质性的凝结倾向于硬化成封闭的、只内向黏合的壁垒。

这一分歧点，将在后面讨论循环断裂时成为核心焦点。这里先把它钉住：形式不是有用的必然产物，而是有用在特定条件下的或然产物。条件就是：有用能否把一群不同来路的人逼进共同承载的关系里，让他们在反复协调具体麻烦的过程中，把彼此从可替换的同行者变成不可替代的特定面孔。没有共同承载的高密度，产出的只是功能效率；有共同承载的高密度，产出的才是形式的第一拍。

五、循环的动力学：共同承载生形式，形式聚新承载

现在可以把前几部分分开处理的概念放进同一个动力模型里了。这个模型的核心装置，是一个将“共同承载”与“形式”正反馈连接为持续旋转的闭合环：异质性人群在共同承载具体麻烦的过程中生成形式，形式产生对外来者的吸附力，吸附力引入新的、携带未成形有用的异质性人群，这群人进入既有的承载网络，在共同面对新麻烦的过程中生成新形式。这个环完整闭合之日，就是一座城市获得内生性新陈代谢能力之时。

第一拍：共同承载→形式生成。这是上一部分已经论述过的过程，这里只需要加上动力学维度。这一拍的效率取决于两个变量的交叉：承载强度（一群人在多大程度上“必须”持续共同面对麻烦），以及来源异质性（这群人的职业、代际、出身在多大程度上彼此不同）。高承载强度但低异质性的凝结，产出的形式趋向内卷——外号、切口、仪式高度精微，但对圈外人高度排斥。低承载强度但高异质性的混合，产出的形式趋向飘散——可能有短暂的新奇碰撞，但无法结晶为持续的形式。只有高承载强度与高异质性同时出现时，形式才会朝向外溢的方向成长：它内部有足够的特定性来产生凝聚力（承载强度贡献的），同时又有足够的开放性来吸纳新人（异质性贡献的）。

港口的功用（货物、工人、码头、报关行）和民居的功用（住户、家庭厨房、街角士多店、棋牌室），如果被一条功能分区的规划线彻底隔开，各自承载强度再高，也只能各自溢出各自的小形式；但如果是自然混合——码头工人家就住在离港口十分钟步程的巷子里，他的妻子在巷口开一家卖凉茶的铺子，孩子们在码头边和船老大的孩子一起玩耍——那么码头上的麻烦和巷子里的家常就会互相渗入，码头上的切口会和巷子里的邻里规则杂交，产出一种无法在任何单一功能区内部生成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不可复制的——它只在这片具体的、不可精确描述的混合地带里长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被精细规划的功能分区从来产不出那种让人心头一紧的街头场景：不是规划者不注重品质，而是规划本身掐断了承载的异质性，而承载的异质性恰恰是形式诞生的产道。

第二拍：形式→吸附新承载。这是本文模型中最反直觉的一步。主流的叙述到此为止：某条街道因为一套独特的生活形式而有了“特色”，因此吸引了游客，或催高了租金。这个叙述是外生的——它把形式的后果局限为“对既有有用的补充性消费”。但循环模型主张：形式的吸附力，不是外在于有用的消费力，而是一种内生的、指向有用更新的聚拢力。

形式具体吸附什么？它吸附三种东西：携带未解决难题的人，携带冒险冲动的资本，以及携带异质性知识的外来者。请注意：这三种东西在被吸附过来的时候，都仍然是“麻烦”——它们不是现成的解决方案。一个被旧金山特定街区的氛围吸引而来的年轻人，身上只有一个背包和一份尚未找到表达媒介的创作冲动。他还没有作品，没有收入，甚至不知道自己具体要做什么。从任何实用主义角度看，这是城市吸纳了一个负担。一群被苏荷区空旷厂房和非法画廊吸引来的艺术学生，他们付不起标准商业租金，也没有稳定消费力，他们对地区经济的短期贡献几乎为零。但正是这些“负担”，在另一个时间尺度上构成了城市有用更新的唯一真实来源。那个背包的年轻人，五年后可能创办一家新的工作室，二十年后可能变成这个城市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的一张名片。他最初被吸引来的那个形式，为他提供了进入这座城市的门票——不是就业的门票，而是他感觉到“这里允许我的东西还不成形”的门票。而他的有用，要在漫长的孵化、试错、碰撞之后，才反过来为这座城市注入下一轮养料。

这里就是本文的循环模型与雅各布斯的多样性正反馈（Jacobs, 1961）出现清晰裂口的地方。雅各布斯论证的是：混合用途让街道更安全，安全吸引更多人使用街道，更多的人使用街道让商业更繁荣，更繁荣的商业又进一步提高安全和使用频率——这是从功能到功能的增强循环。在雅各布斯的环路里，每一拍都落在有用上。而本文的循环要求有一拍落在非功能的形式上：吸附的发生不是因为这地方“更好用”，而是因为这地方让人觉得“这里在发生我生命里的事”。被吸附来的人起初带来的也不是更好的功能——他们带来的是半成品、是风险、是负担。只有当循环的两拍不被压缩为同一维度时，城市才可能获得那种“不依赖特定产业的持续新陈代谢能力”。换言之，雅各布斯的环路可以解释一个街区为什么充满活力地运作；本文的环路要解释的是，当活力所依附的那个产业消失之后，为什么有些街区仍然没有死。区别不在循环的形状，而在循环里是否多出了一层本体论上独立于有用的环节——形式。

由此也可以厘清本文与列斐伏尔空间辩证（Lefebvre, 1974）之间的边界。列斐伏尔的表征的空间是对空间实践的否定——诗性体验在他那里是抵抗场所，是对功能空间的超越。本文没有把形式放在有用的对立面。形式是从有用的内部、在有用的高度共同承载中，作为副产品溢出来的。它不否定有用，不需要抵抗有用；它需要的恰恰是有用的持续共同承载——有用是它的供血系统。这一区别不是纯理论的——它影响到对城市现象的判读。在列斐伏尔的框架中，一个被资本商品化的“有特色的街区”是表征的空间被空间实践吞噬的悲剧；而在本文的框架中，同一个现象需要被追问的是另一组问题：这个地方的形式还在从当下的共同承载中生成吗？还是只剩下旧形式的壳在被消费？如果是前者，循环还在转，只是形式在变异；如果是后者，循环已断，无论物理外观维持得多好。

第三拍：回环的闭合。当新的有用被吸附之后，它进入这座城市既有的承载网络。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新有用）不会只停留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他需要材料，于是刺激出一条供应特殊画材、金属件、电子元件的供应链；他需要展示，于是废弃的店面被改造成临时画廊，吸引另一批带着好奇心的人进入这条街区；他需要生活，于是街角的咖啡店延长了营业时间，增加简餐，变成这一群人固定的碰头地点。新有用落地之后，与旧有的承载网络重新发生互渗。经过又一个周期的共同承载，新的形式长出来——一种不同于原来码头文化的、混杂着艺术、技术和移民社群的新街区气质。这种新气质，再次成为形式，开启下一个吸附循环。

这便是循环成为循环的那个时刻。它不是有用和形式排成一条直线、先后接力，而是共同承载生出形式、形式聚来新的承载者、在新承载中生发新形式——这一整套动作在同一个地理空间内不断重复，每一圈都比上一圈转得略深，整个生态的厚度和异质度持续增加。一座城市一旦拥有这种自激发的闭合环，它就获得了内生性的、不依赖外部特定产业周期的新陈代谢能力。它能承受单个产业的衰败，因为它的形式还在吸附着下一轮的有用，而新有用会找到自己的新产业。它能承受人口波段的进退，因为随时有一批新的、被形式吸引而来的人注入新血液。它很难死的理由，不是在任何一个时间切面上它有多强大，而是在任何一个时间切面上它都在为下一个时间切面储备肥料。

这个循环不是一旦形成就自动永动的。它有两个常见的断裂点。

断裂的第一种形态：承载失去异质性，形式无法再生。这通常发生在城市经历过长时期的成功之后。成功的经验被固化为一套可量化、可管理的标准操作——什么样的产业要引进，什么样的空间要保留，什么样的业态要扶持，全部进入指标体系。每一轮优化都让有用更高效，但也更规范、更同质。共同承载需要的那种低度混乱——不同性质的活动在未经规划的状态下彼此摩擦、碰撞——在这

种管理逻辑下被系统性地清除。茶档被要求整改消防，棋摊以“占用公共空间”为由清退，老街区被成片拆除让位于商业综合体。每一个决策单独看都是有用的优化。但这些优化的累积效果是，那个让异质性人群得以共同承载具体麻烦的日常缝隙，被越填越死。城市变成了一台越来越精密、也越来越缺乏互动摩擦面的机器。人还要用它，但不再往里面投注任何超过必要限度的东西。循环的第一拍就断了。

断裂的第二种形态：形式脱离承载，飘成无根的景观。这通常发生在城市的部分区域已经被识别为“有特色”之后。特色被发现的同时，它的稀缺性就被定价。定价吸引资本，资本推动改造，改造为了服务外来消费者的想象，把原先那个混着汗味、油烟味、争吵声的共同承载现场，悄悄替换成一个看着很像但肌理完全不同的商品现场。老房子里住的不再是三代同堂的本地家庭，而是按日计费的民宿旅客；茶档变成连锁精品茶馆，伙计换成了穿统一制服的店员。从视觉上，什么都还在，甚至比原来更好看；但从动态上，这块地方已经不再发生新的共同承载——它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们在此解决真实生活难题的地方，而是一个为了让别人拍照而维持姿态的舞台布景。舞台布景不需要从共同承载中生出新形式，只需要保养旧形式的壳。于是第二拍断了。断了这拍的循环，会继续转一阵子，但转的是惯性，不是动力。等到那批最初赋予它“特色”的人——无论是居民还是创业者——全部被挤出，旧形式的壳就会开始自己干裂。[6]

两种断裂不是两种不同的“病”，而是同一个循环在不同的初始条件下走向失效的两种路径。如果断裂发生时，城市的有用整体上仍强大但已高度硬化，走的是第一条路。如果断裂发生时，城市的某些区域已经先被识别为“有特色”而遭到资本捕获，走的是第二条路。两种路径共同的死因是同一个：循环两拍之间的转化通道被关闭了。被关闭的原因不同，但结果是等价的：城市失去了内生性的新陈代谢能力。

六、经验中的循环：三组案例的差异化结算

模型需要经验上的支撑。本节选取三组案例：苏荷区在1950至1980年代的循环完整运转，曼彻斯特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循环无法启动及其后续转型尝试，鲁尔区从1970年代至今的循环不完全修复。三组案例不是要“证明”模型正确——三组案例无法提供严格因果意义上的证明。它们的功能是展示：在差异极大的历史条件下，模型的机制指向了一组可以清晰辨识的经验过程。[7]

苏荷区

1950年代的苏荷区是一片被规划判了死刑的废弃轻工业区。市政计划修建的下曼哈顿快速路将穿过这里，拆迁预期下地价崩盘，业主放弃维护，厂房大面积空置。城市的有用在这里大幅退场：没有正规商业愿意进入，没有公共服务愿意升级。但恰恰是有用的强力退场，释放出了空间缝隙——大量空旷、廉价、可随意改造的铸铁厂房。一群无法负担曼哈顿正规租金的艺术家翻窗进入这些空厂房，接通临时电线，布置出非法工作室和地下展厅。

从这一刻起，两组原本不相干的有用在苏荷区发生了高强度的共同承载。第一组是本地原有的残余有用：意大利移民社区的杂货店、五金铺、小餐馆，它们为这片区域的日常运转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功能。第二组是艺术家带来的新有用：对材料的需求、对展示空间的需求、对深夜餐饮和廉价社交场所的需求。这两组人在空间上高度混合——艺术家的工作室就在杂货店楼上，他们去街角的咖啡馆赊

账，咖啡馆老板的子女跟着艺术家学画画。这种跨越阶层的共同承载，在几年之内就溢出了一种极强、极可辨识的形式。这种形式不是某一件作品或某一家画廊，而是一种整体的空间气质——粗粝、临时、不设防，任何带着半成品想法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扇能推开就进的门。

关于这种“气质”是如何被具体感知的，有大量的间接证据。一位后来成名的画廊主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1960年代初第一次走进苏荷区时的感受：“那些街道完全不像纽约的其他地方。没有门卫，没有前台，没有‘请提前预约’。你可以直接走到一扇铁门前面，按一个生锈的门铃，门开了，一个满身颜料的人探出头来看着你——不是在等你出示邀请函，而是在等你说点什么让他觉得有意思的话。那个门槛，不是阶级的门槛，不是资本的门槛，而是‘你对什么东西着迷吗’的门槛。”这段叙述的核心不在于它描述了苏荷区的物理空间——铸铁建筑、阁楼、生锈的门铃——而在于它描述了形式如何作为一种进入壁垒的替代机制在运作：在别处，一个人的入场资格是他的简历；在苏荷区，入场资格是他的“不成形的东西”能否激发出另一个已经在这里的人的好奇。这个门槛是非功能性的——它不筛选资本、不筛选社会地位——但它严苛到了极点：它只对某一类特定的人敞开，而对另一类人（那些带着成品资本和成品身份来的人）构成一种隐秘的排斥。

这就是循环第一拍的完成。这个形式随后启动了第二拍。1970年代，纽约之外的年轻艺术家、音乐人、写作者开始成群涌向苏荷区。他们的涌入不是被就业机会吸引——苏荷区没有提供就业机会——而是被那种“这里允许你只着迷于一件事，而不必先证明它能赚钱”的准入信息所暗示的可能性吸引。被吸附来的这些人，起初对地区经济的贡献几乎为零，甚至是负的——他们占用空间、消耗水电、产生垃圾、不纳税。但他们带来了下一轮共同承载的种子：他们之中有人后来创建了画廊、创办了独立杂志、开办了实验剧场、开启了后来被命名为“苏荷风格”的设计事务所。这些新有用又与本地的旧有用发生互渗——画廊需要装框的工匠，工匠开始带徒弟；剧场需要做道具的木工，木工在隔壁开了作坊。又一轮共同承载之后，新的形式溢出——不再是1960年代的粗粝先锋艺术，而是一种混合着艺术、设计、时尚和高端商业的混杂气质，这种新形式又在1980年代吸附了品牌旗舰店和建筑师事务所。循环没有停，只是形式在变异。

必须同时记录这个循环内部的破坏性面向。祖金在《阁楼生活》（Zukin, 1982）中详细记录了苏荷区的士绅化过程：形式的稀缺性被资本定价之后，最初那批赋予苏荷区其形式的人——艺术家、小作坊主、长期居民——被加速上涨的租金系统性地驱逐。本文的模型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形式的吸附力不是一根单向磁铁。它同时吸附两种东西：携带半成品有用的新来者（艺术家、创业者），和携带成品资本的投资客。在循环的早期，前者占据主导，因为资本还没有发现这里。一旦形式被充分识别和定价，后者的涌入就会在数量和出价上压倒前者。当上涨的租金让新来的年轻艺术家再也进不来时，循环的第二拍就从“形式吸附新承载者”转变成了“形式吸附资本”——而资本不产生新的异质性共同承载，它只消费存量形式。苏荷区在1980年代之后的状态，在本文的定义下不是“循环失败”，而是“循环的吸附形态发生了变异”：旧的形式仍在吸附资源，但吸附物的构成从“携带未成形有用的承载者”偏向于“携带已成形资本的消费者”。这导致下一拍无法启动新的承载→形式生成，循环进入惯性滑行。这不是对模型的证伪，它是模型在边界条件变化时的预期结果。真正决定苏荷区未来命运的问题不是“士绅化发生了吗”，而是“在现有形式被资本充分定价之后，是否还有空间让新的共同承载在新的移民、新的创意实践中重新发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循环会以变异后的形态继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形式最终会耗尽它的吸附力。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在1830至1910年代由棉纺织业驱动，长出了一整套极致服务于单一产业有用的基础设施：运河和铁路专为原棉输入与棉布输出铺设，技术学校专为培养纺织技工而设，整个城市的阶级结构与社区文化都围绕着棉花被组织起来。这套有用的效率在十九世纪无人能敌。

但本文的模型会立即追问：它的有用内部是否发生了异质性的共同承载？回答是：很少。棉纺织业的高度专业化和空间集中，使得曼彻斯特的有用凝结朝着单一职业群体内部加密的方向走，而非朝着跨阶层、跨职业互渗的方向走。工厂主和工人的居住区是隔离的，商业业态以服务于纺织从业者的基本需求为主，缺乏那种能把不同性质的有用编织在一起的混合地带。曼彻斯特当然有丰富的工人阶级文化——足球、工会运动、合作社、酒吧社交——但这些文化的形式倾向于在同质群体内部加密（强化阶级认同与内部团结），而非跨越阶级边界去吸附异质性的新有用。在本文的模型中，这不是说曼彻斯特的文化“不是真正的形式”——没有那种意思。而是说，这种形式的生成条件（低异质性）决定了它的吸附力方向：它深刻地凝聚了本阶级成员，但没有大范围地把携带异质性有用的外来者拉进这座城市的共同承载网络。

因此，当全球棉纺织产业链在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向亚洲转移时，曼彻斯特的有用迅速失效。工业衰败之后，形式没有启动第二拍的能力：没有出现那种被曼彻斯特特定的形式吸引而来的异质性新有用——年轻艺术家、新产业创业者、移民创意阶层——大规模注入。城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是第一层次有用的依附者——只跟特定产业就业绑定——有用一退场，他们唯一的选择是离开。曼彻斯特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持续流失人口。

然而，这里必须正面处理一个最强有力的反例：曼彻斯特的音乐场景。从1970年代的Joy Division到1980年代的The Smiths、New Order，再到1990年代的Oasis和“狂野派对”文化，曼彻斯特产出了一整套对全球创意人群具有强大吸附力的音乐形式。如果本文模型声称曼彻斯特的循环从未充分形成，那么这一音乐场景——恰恰是一种“形式”——为什么没有启动循环的第二拍，大规模吸附异质性新有用进入曼彻斯特？

本文的回答是：曼彻斯特的音乐场景确实构成了形式，并且确实产生了对外吸附力。但关键差别在于：吸附进来的“新有用”是否在本地的共同承载网络中落地和发生互渗？曼彻斯特的音乐场景虽然吸附了大量的外部文化资本和游客，但被吸附的人群中只有极少部分在曼彻斯特本地扎根、进入跨阶层的共同承载过程。新浪潮音乐家们在曼彻斯特成名之后，多数迁移到了伦敦或纽约；音乐场景带动的相关产业（录音、设计、时尚），在全球产业链中与曼彻斯特本地的其他有用（残留的制造业、社区网络）之间的互渗极弱——它们是“飞地式”的，嵌入的是全球文化经济的网络，而非本地的异质性承载网络。曼彻斯特的形式是强大的，但它的吸附物与本地的其他有用之间没有发生充分的二次咬合。这就是本文模型的边界条件在起作用：形式吸附新有用，只是循环的第二拍；新有用能否与既有的本地承载网络发生异质性互渗，才是循环能否闭合的关键。曼彻斯特在这一点上卡住了。

曼彻斯特的后续转型（1980年代末至今）在本文的模型中可以被描述为人工启动循环的尝试：在没有充分自发的第一拍的前提下，用强势的政策与资本直接空降一批新有用（BBC媒体城、大学扩建、创意产业园区），试图创造吸附效应。这种策略止住了人口下滑，但它的持续力依赖于外部投资是否源源不断地涌入；它没有形成内生的承载→形式→新承载的闭合环。直到今天，曼彻斯特中心区的繁荣与周邻旧工业区的凋敝仍高度共存。在本文的模型中，这不是彻底的修复——这是一次成功的

止血。循环是否真正闭合，取决于未来几十年中心区的新有用能否与本地的残余有用发生足够异质性的共同承载，进而溢出新的形式。这还没有发生。

鲁尔区

德国鲁尔区从煤钢重镇向文化经济区域的转型，提供了第三种不同的路径。鲁尔区的问题本质上与曼彻斯特相同：历史上单一产业有用太强大，有用内部的异质性共同承载不充分，第一拍的形式产出贫弱。等到煤钢衰败，没有内生形式来聚拢新有用。鲁尔的应对策略与曼彻斯特不同：它不是从外部注入一个强势的替代产业，而是试图直接经营形式——把废弃的矿井井架改造成工业博物馆，把巨型瓦斯罐改造成音乐厅和艺术展厅，把整个区域的叙事从“德国工业心脏”翻转为“工业文化之路”。这是一种逆向操作：直接经营形式，期望形式去吸附新有用。

结果呈现出分化。在局部尺度上，如埃森的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建筑群，确实出现了一个小型循环的启动：建筑师、设计师、文化机构的从业者被那里的空间质感吸引，搬入工作和生活；周边街区随后长出了配套的咖啡馆、工作室、周末市场。人种学观察表明，这些被吸引来的人描述自己决定的核心动机时，反复使用一个表述：“这里不漂亮，但这里允许你动手。”关税同盟煤矿的改造遗留了大量未完成的、粗糙的、可被非正式使用的空间——设计没有把一切都塞满，而是保留了场地原有的工业粗糙感和空间弹性。这种弹性允许一个年轻的设计师花很少的钱租下一个角落当工作室，允许一群学生在空地上做临时装置。换句话说，尽管形式的整体框架是被“经营”出来的，但它的质地中留有足够的缝隙让半成品的有用可以挤进来。而那些在全区域尺度上失败的改造项目，往往在完成度上做得太精致、太完整——它们向访客传达的是“请欣赏我”，而非“你也可以在这里做些什么”。缝隙被堵死了，共同承载就无从发生。

这个教训不是“经营形式注定失败”。它更精确地说是：形式能否启动循环的第二拍，关键在于它是自发还是经营出来的，而在于它是否为新承载者的进入预留了低成本的、不被过度管理的进入缝隙。鲁尔区的分化恰好说明这个变量在起独立作用。

三组案例交叉支撑了同一个模型的核心命题：当且仅当异质性人群在共同承载具体麻烦的过程中生成形式，且形式能吸附携带未成形有用的外来者进入并与之发生新一轮共同承载时，循环才完整运转。苏荷区的循环是自发启动且持续变异的，但在士绅化后吸附形态发生了变异。曼彻斯特在工业时代缺乏异质性共同承载，循环从未充分形成，而它强大的音乐形式因为与本地有用缺乏互渗，未能独立启动循环。鲁尔区的部分成功与部分失败，反过来验证了“形式必须为新承载者留出进入缝隙”这一边界条件。

七、与最近邻的对话：为何“形式”不可被还原

前面几部分已经论证了本文的核心模型。但一个硬问题必须在这一部分正面回答：本文的核心概念——“共同承载”和“形式”——与城市研究中几支既有的强大传统之间，究竟区别在哪里？如果本文只是在用新词重述已有的洞见，那么所谓的“不可还原性”就是幻觉。

以下逐一与三个最近的邻居进行严格对话：场景理论、地方依恋研究、集聚经济理论。对每一个邻居，执行以下操作：（1）指出其核心解释变量；（2）给出一个具体的经验情境，在该情境中，既有理论的变量与本文的“形式”或“共同承载”发生预测分歧；（3）阐明本文的理论收益。

与场景理论的对话

以克拉克（Clark，2014）等人为代表的场景理论，将城市的吸引力分解为一组可测量的“舒适物”（amenities）维度：合法性（传统主义vs自我表达）、戏剧性（邻里关系vs魅力展示）、真实性（地方根性vs全球通约）。这些维度通过组合，产出不同的“场景”，场景进而吸引特定类型的人群（如创意阶层），产生经济后果。场景理论的核心承重变量是“舒适物的组合配置”——一个街区有多少咖啡馆、剧院、公园，它们的风格是传统还是前卫。

场景理论在解释苏荷区1970年代的吸附力时，可以给出一个有力的描述：苏荷区当时的“场景”特征是高度自我表达（非法画廊、前卫装置）、高度邻里关系（艺术家之间的互相串门和合作）、高度地方根性（铸铁厂房不可复制的粗粝质感）。这个描述是准确的。但它无法解释以下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在同一时期，纽约其他同样拥有废弃厂房、廉价租金和前卫艺术人群的区域——比如下东区的某些地段——没有产出与苏荷区同等强度的吸附力？如果“舒适物的组合配置”是决定性的，那么当两个区域在舒适物配置上高度相同时，理论上应该产出相同的吸附力。但它们没有。

本文的回答是：苏荷区与其他类似区域的关键差别，不在舒适物的组合配置，而在舒适物背后的“承载结构”。苏荷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艺术家群体与本地的意大利移民社区之间，发生了跨越阶层和职业的实质性共同承载——杂货店老板赊账给艺术家，咖啡馆老板的子女跟着艺术家学画画，本地居民和外来艺术家在同一个街角处理垃圾清运、安保巡逻、临时接电这些具体的日常麻烦。这种承载不是“邻里关系”这个场景维度所能捕获的——邻里关系可以存在于任何同质群体内部，而苏荷区发生的是一种跨越巨大社会距离的、围绕具体生存问题的共同承载。它是这种承载，而非舒适物的组合本身，产出了那种在别处不可复制的形式。下东区的某些区域同样有艺术家和廉价空间，但因为种种历史原因——移民社区的构成、空间与民居的隔离程度、本地商业业态的封闭性——未能发生类似强度的跨阶层共同承载，因此其形式质地不同，吸附力也不同。

辨别表：控制租金水平和基本舒适物密度后，如果一个街区内部存在高强度的跨阶层共同承载（操作化为：不同职业群体之间非亲属互助事件的频次、跨阶层非正式社交网络的平均度），本文模型预测该街区将产出更高强度的对外来未成形创造者的吸附力；场景理论则预测吸附力主要由舒适物的组合风格决定，跨阶层互动只是“邻里关系”维度的一种叠加，不具备独立效应。

与地方依恋研究的对话

地方依恋研究（Relph, 1976; Tuan, 1977; Altman & Low, 1992）处理的是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纽带。它识别了一系列影响依附强度的因素：居住时长、社会网络密度、个人生命事件的嵌入、物理环境的可辨识性。该传统的核心承重变量通常是“居住时长”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积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得越久，参与的社会互动越多，对地方的依恋越强。

这个变量在多数情境下与“形式”高度共变。但在一个特定的经验情境——芝加哥的皮尔森（Pilsen）社区——两者出现了可辨识的分离。皮尔森是一个墨西哥裔移民社区，居住时长极长——许多家庭在此生活了三四代人——社会网络极密，地方认同极强。按照地方依恋理论，这里是极高依恋的典型。然而，皮尔森在对年轻一代的吸附力上表现平庸：在社区的第三代、第四代年轻人中，离开的比例并不显著低于其他类似收入水平的社区。留在社区内部的年轻人，他们的“留”更多是出于

家庭责任和网络义务，而非主动的选择性归属。社区的向外吸附力——对外部非墨西哥裔群体的吸引——更是几乎不存在。

本文的模型对此的解释是：皮尔森的“形式”——虽然深刻地凝聚了内部成员——是在低异质性承载的条件下生成的。社区内部的承载强度极高（几代人共同扛过移民的生存压力、身份歧视、经济边缘化），但承载者的来源异质性低（同族裔、同阶层、同宗教）。这种条件下产出的形式，质地是内向加密的：它有极强的内部凝聚力，但对外构成壁垒。皮尔森的年轻人感到的不是“我被这里排斥”，而是更微妙的一种压力——“如果你离开，你就背叛了这几代人一起扛过来的东西”。这种形式的质地，在吸附力谱系上偏向内向黏合而非外向吸附。与之对比，同样是低收入移民社区的纽约下东区在二十世纪初，因为犹太裔、意大利裔、波多黎各裔人群在空间上的高度混合，发生了跨越族裔的异质性共同承载，最终产出了那种具有外向吸附力的形式——从爵士俱乐部到垮掉派诗歌到实验戏剧，下东区在二十世纪的大半段里持续吸引寻找“半成品”的创作者。

辨别表：控制居住时长和社会网络密度后，如果承载者的来源异质性（操作化为：街区内部的职业多样性、代际混合度、族裔多样性）超过特定阈值，本文模型预测形式将从内向黏合转向外向吸附，产出更高的对外部未成形创造者的吸引力；地方依恋理论则预测依附强度主要由居住时长和社会网络密度解释，异质性顶多作为调节变量而非自变量。

与集聚经济理论的对话

以格莱泽（Glaeser，2011）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将城市的文化魅力纳入经济分析框架，论证了高密度、多样化的城市环境通过降低信息成本、加速技能匹配、促进创新溢出而吸引人力资本。在这一框架里，“形式”——那种让人单纯愿意待在一个地方的气质——可以被操作化为“消费便利性”或“信息交换网络的外部效应”。

但这一操作化有一个盲区。格莱泽在解释为何某些城市在传统制造业衰败后成功转型时，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存量——高素质人口在一地的集聚本身会产生“消费城市”的吸引力，从而抵抗衰退。但这一逻辑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传统产业衰败的城市同样拥有高素质人口（典型的大学城），却没有出现类似波士顿或旧金山的后工业复兴？比如，纽约州罗切斯特市拥有世界级的光学工业和一所研究型大学，在柯达衰败后，它的高素质人口存量并未消失，但城市依然持续失血。本文的解释是：罗切斯特的高素质人口在空间和社会关系上是隔离的——工程师和研究员住在郊区，大学校园和产业园区之间有明确的物理隔离，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缺乏共同承载具体生活麻烦的场景。这座城市的“有用”仍然在运转（大学在招生、医院在运营、剩余的光学企业在生产），但它的有用内部没有发生异质性共同承载，因此没有溢出形式。没有形式的城市，高素质人口是“存放”在此的，不是“属于”此的。一旦个人职业规划出现更好的选项，他们随时可替换地离开。

辨别表：控制人力资本存量和就业密度后，如果一座城市的异质性共同承载强度（操作化为：不同职业群体在非工作场景中共同参与具体事务的频次）低于某个阈值，本文模型预测城市将不具备内生性的抗衰败能力——它的高素质人口是可替换的；集聚经济理论则预测，只要人力资本存量和消费设施密度足够高，抗衰败能力就会随之提升，承载形式只是这一机制的附带现象而非独立变量。

这三个对话不是为了“击败”现有理论，而是为了标明本文理论的确切位置。场景理论、地方依恋研究、集聚经济理论在各自的层面上都是有效的——它们在处理可测量、可分解、可纳入回归模型

的变量时，比本文的模型更便利。本文不试图取代它们。本文试图论证的是：在那些最关键的转折点上——为什么两个舒适物配置相似的街区命运迥异？为什么两个同样“地方感强”的社区一个向外吸附、一个向内萎缩？为什么两个人力资本存量相当的城市一个转型成功、一个持续失血？——既有理论留下的那个残余解释空间，恰好是本文的“形式”与“共同承载”所能填充的。这个残余不是残余的无知，它是方法论边界本身制造出来的一个本体论盲区：不能把一个整体的、发生性的过程分解成若干独立变量的加权求和。本文不要求更精确的测量；本文要求承认，在测量的边界之外，还有一些只能在发生中被看见的东西。

八、结论：让循环转下去

现在可以回到文章开篇那个经验上的不对称，并给出本文的总结性回答。

为什么那些功能完善、指标健康的城市仍在失去人？因为它们提供了丰沛的有用，却让这种有用被功能分区、标准化管理和效率优化碾成了一片光滑的平面。在这片平面上，不同来路、不同职业、不同代际的人失去了彼此摩擦、共同面对具体麻烦的机会。失去了共同承载的有用，即使总量再大，也无法在高度密集的日常互动中把那种多余的形式逼出来。没有形式的地方，人是工具性地定居的。工具只要还能用，就留着；有更好用的，立刻换掉。在功能良好但没有形式的城市里，人不是市民，是用户。用户没有忠诚。

那些功能残缺却仍然吸附人的地方，则在相反的逻辑上运转。它们的有用也许不完善，但不同的有用之间是互相咬合、共同承载的，形式已经长出，正在向外释放吸引力。有时候，功能残缺本身就是共同承载得以发生的条件——过度的功能完善会把所有用途各就各位地安排在指定的格子里，从而消灭了承载所需要的摩擦面。当规划把一切都填满时，它同时填死的是形式诞生的那道缝。

所以，一座城市不死的秘密，不是它的有用永不衰退，而是它内部有用与形式之间的转化通道始终开着。有用衰退了，只要形式还在吸附新的承载者，新的承载就会找到自己的有用形态；形式变异了，只要新的形式仍然从当下的异质性共同承载中生发，循环就还在转。城市规划这件事，如果把重心从“如何让城市更有用”部分地转向“如何不掐断有用的异质性共同承载”，也许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功能主义的老路。

但这篇论文本身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边界。第一，经验支撑仅来自三组案例。三组案例可以展示模型在不同条件下的解释力，但不能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尤其是模型的核心机制——“共同承载→形式生成”——目前仅通过一个微观案例做了发生学解剖，尚未通过系统的比较案例研究或民族志田野来检验其跨情境的稳定性。

第二，模型中的两个核心变量——“共同承载强度”与“承载者异质性”——目前只给出了概念定义和操作化方向，尚未提供可以直接用于大规模经验研究的测量工具。如何在不同类型的街区中可靠地识别和度量共同承载的存在与否、异质性的高低？如何把“形式”从“氛围”“场景”“地方感”等相邻概念中在经验操作上区分出来？这些问题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使用更细致的现场方法——民族志观察、社会网络分析、长时间尺度的街区追踪——来逐步回答。

第三，本文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去政治化处理，虽然是为了聚焦于“形式如何从有用的内部生成”这一特定问题，但这一处理是有代价的：它搁置了空间形式与权力、资本、阶级之间的复杂

关系。后续研究需要重新打开这个被暂时封存的问题——形式在什么条件下会被权力捕获？它自身是否内在地携带了某种政治性？这些问题本文没能处理，但它们是必须被追问的。

如果要在经验上检验这个模型最核心的预测，最直接的途径是找到一个符合以下条件的城市或街区：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提供了高效率的有用（就业充分、保障完善、设施先进），同时内部的异质性共同承载被有效激活（不同职业、不同代际、不同来源的人群在日常场景中持续共同面对具体麻烦），并且从这种共同承载中自然生长出了可辨识的形式（共享的符号、节奏、非正式规则）——然而，这座城市或街区在面临外部经济冲击时，并未表现出比缺乏这些特征的城市更强的抗衰败能力。换句话说，如果在控制了“共同承载”和“形式”这两个变量后，城市的长程韧性并未得到显著提升，那么本文的核心判断就需要被重新考虑。[8]

更具体地，本文给出以下可操作的证伪条件：在控制租金水平和就业机会后，如果一组街区的异质性共同承载强度（通过非亲属互助事件频次、跨职业非正式社交网络度等指标度量）与其在产业衰退期的人口保留率及新创业活动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或者该关联完全被租金水平和就业密度所解释，则模型失效。

在这样一个反例被确认之前，本文的判断暂时站得住：城市存续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的有用永不衰退，而在于它让不同的人在对具体生活的共同承载中，把彼此从可替换的工具变成不可替代的面孔。那种从共同扛着的麻烦中长出来的形式，是城市对抗衰败的最后一道防线。城市规划这件事，归根到底，不过是在这道防线被管理逻辑一寸寸扫平之前，给它留出足够的、能够再生的缝隙。

附论一·最近邻切割（续）

本节由学员专栏编辑部在发表前补入，只处理原稿未正面对质的最近邻，不改动作者的命名、论证与结论。每一节按「承认占位 → 剩余分工 → 方向相反的可裁决预测」三段推进。

附一·1 与奥登伯格「第三地」的切割：场所类型与结晶事件

奥登伯格提出的「第三地」（家与工作之外的、低门槛的、平等的、有常客的公共场所）正是本文所说的那种「非功能性的、可被识别与记忆的共同生活场所」，而且他同样主张它对社区活力不可或缺。这是本文必须正面承认的一处占位：如果形式就是第三地，本文的整套发生学论证只是给一个已有名词换了包装。

分离线在于：第三地是一个**场所类型**，由一份属性清单定义——中立地带、拉平身份、以交谈为主要活动、有常客、气氛朴素。清单可以被照着建。本文所说的形式不是场所类型，而是**一次结晶事件的产物**：它没有属性清单，只有发生条件——一群来源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具体难题上反复摩擦，直到彼此的存在从「可替换的工具」变成「跟谁一起扛」的特定面孔。第三地可以在没有任何共同难题的地方被成功建造并稳定运转；形式不能。

由此得到一条方向相反的可裁决预测：在一个第三地密度极高、但居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难题的新建富裕郊区（咖啡馆、健身房、社区中心、共享厨房一应俱全，各家生计彼此独立），奥登伯格框架预测社区活力应当较高，本文预测形式不会结晶——该区在遭遇产业或人口冲击时的人口保留率

与创新创业活动，不高于第三地密度低但共同承载强度高的旧街区对照组。「第三地密度」与「共同承载强度」两个变量正是在这一格上分离。

附一·2 与普特南「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切割：网络存量与关系跃迁

普特南的桥接型社会资本指跨越异质群体的联结，长期被用来解释地方经济活力与制度绩效，它同样强调「异质性」，同样把它当作活力的来源。这是本文的第二处占位，且比第三地更危险，因为它已经高度可测量。

分离线在于测量对象的性质：桥接资本是**网络的存量属性**——谁与谁相连、跨群体的联结有多少条，可以由社团登记、通勤矩阵、弱关系数量测得，它回答「连接的广度」。本文的共同承载是**关系性质的一次跃迁**，它不问有多少条连接，只问这些连接是否经历过那个转折：在同一个不可退出的具体难题上被共同暴露，直到对方从一个功能位（「一个会修水管的人」）变成一个面孔（「老陈」）。一个街区可以有极高的桥接资本存量而从未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跃迁——那正是当代大量「活动很多、活力很低」的社区的形态。

可裁决预测：在控制桥接社会资本存量（跨职业社团参与度、弱关系数量）之后，共同承载强度仍独立预测产业衰退期的人口保留率与创新创业密度。若控制之后共同承载的系数归零，则本文的机制已被普特南的既有变量完全吸收，「共同承载」应当被撤销为一个多余的命名。

附一·3 对场景理论的补刀：可调配的自变量与不可直接生产的产物

正文第七部分已与 Silver 与 Clark 的场景理论对质，但对质停在「场景是可测量的美学维度组合」这一层，未触及二者最要紧的一处分歧。

场景理论把美学维度当作**可被规划者调配的自变量**：政策可以有目的地提高一个街区的「魅力」「正宗性」「越轨性」得分，这正是它作为政策工具的吸引力所在。本文的形式在定义上**不可被直接生产**——凡被直接生产出来的都是形式的复制品，它吸附的是资本而不是新的异质承载者。这不是一个关于难度的经验判断（「很难做到」），而是一个关于因果次序的构成性判断：形式是共同承载的副产品，绕过共同承载去直接生产形式，产出的必然只是形式的外观。

可裁决预测：由政府或开发主体主导、以场景指标为明确目标的街区改造，其形式指标（可识别性、可记忆性、外部媒体提及率）在三年内显著上升，而共同承载强度不上升；五年后其创新创业密度不高于同期同类未改造街区。若自上而下的改造能够稳定地同时抬高形式指标与共同承载强度，则「形式不可被直接生产」这一断言被推翻，本文的循环模型需要让出一条由外部注入直接启动的路径。

附论二·可裁决预测

以下每一条都可以把本文判错。它们与正文已给出的证伪条件并列，而不取代它们。

1. **共同承载的独立效应**：控制租金水平、就业密度与桥接社会资本存量之后，异质性共同承载强度（以非亲属互助事件频次与跨职业非正式社交网络度合成）仍显著预测产业衰退期五年内的人口保留率。若三项控制变量吸收全部效应，本文的核心机制即被判为既有变量的重述。

2. ****结晶的不可代产性****：以场景指标为目标的自上而下街区改造，在改造后三年内形式可识别性上升而共同承载强度不上升，且五年后新创业密度不高于同期同类未改造街区。若改造能同时稳定抬高两者，「形式不可被直接生产」被推翻。
3. ****循环第二拍的反转****：在形式已被充分定价的街区（租金增速连续三年高于全市中位），新迁入者中「携带半成品有用者」（自雇、初创、独立生产者）占比逐年下降而「携带成品资本者」占比上升，且该反转先于人口总量下降出现。若两类迁入者比例在定价之后保持稳定，本文的正反馈一反转模型失效。

注释

- [1] 本文对列斐伏尔“表征的空间”概念的借用是选择性的：剥离其政治哲学向度（阶级斗争与日常生活革命），仅保留其关于诗性体验不可被功能空间还原的本体论洞见。这一取舍之合法性在于：本文试图考察的是那种不依赖对抗性情境、从有用内部共同承载中自发形成的形式，而非作为抵抗阵地的形式。两者属于不同的经验类，不可用同一概念装置统一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否定了列斐伏尔的政治向度——本文只是处理了另一类现象。后续研究应将两种形式的发生条件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内进行比较，本文暂不做此工作。
- [2] 格莱泽及其城市经济学传统将城市文化魅力操作化为可量化的“消费”指标，如咖啡馆密度、创意阶层占比。这并非理论缺陷，而是该方法论的内在边界。本文关注的“形式”恰好落在此方法论光学的范围之外——它不是可分解为若干独立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的量，而是一种在特定共同承载过程中涌现的整体质性。因此，本文的论证不构成对城市经济学范式的否定，而旨在提出一种互补的解释层面：在经济学可以量化的区间内，它看到的是有用以消费形态的延伸；在它无法量化的区间内，形式作为一种不可被还原为有用总和的独立层面在起作用。
- [3] 此处关于仪式性地点与群体依附关系的判断，系对人类学与考古学领域一般性共识的概括。由于本文的论证重心在于将此类发现整合入新的理论框架，而非重现已有证据，故不将其锚定于任何单一著作，以防对复杂比较材料的简化归因。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与特定地点的关系，可参见相关人种学记录中关于“梦创时代”叙事与群体领土行为的讨论。
- [4]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提出早期城市“磁体先于容器”，但将其主要限定于宗教与王权的史前功能，并伴随一种文明兴衰与城市周期律的历史哲学。本文接续“磁体”先于功能完善的直觉，但将“磁体”重新界定为城市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必须持续生产的、从异质性共同承载中溢出的非功能吸引力，并去除其历史哲学荷载。本文的论证不依赖“城市生命周期”之类的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可辨识的机制在任何阶段的可操作性。
- [5] 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以个体自由为规范性焦点，评估一个人能够实现的功能性活动集合。本文的“拆锁”则从城市的结构性条件出发，考察一个地方是否扫除了个体无法仅靠自身努力摆脱的旧身份压迫。两者分析层面不同：森的框架回答的是“一个人拥有何种实质自由”，本文的“拆锁”回答的是“一个地方是否提供了让个体重新运用其能力的社会-空间前提”。拆锁并非可行的能力的扩展本身，而是使可行能力的扩展成为可能的一个结构性前置条件。
- [6] 此处描述的“形式脱离承载”在表象上可能与“士绅化”“迪士尼化”或“景观社会”等现象重叠。本文的判别标准是内在的循环动力：如果一个地方的形式仍在从当下真实的、异质性的共同承载中不断生成并更新，则无论其外观如何，都不应被判为“飘成景观”；反之，若形式仅保留旧壳而停止生发新的承载→形式过程，则循环的第二拍已实质断裂，无论其物理外观维护得多好。
- [7] 本部分所涉苏荷区、曼彻斯特、鲁尔区三组案例，均根据公开的历史著述、学术文献与政策报告进行综合、简化和重构，以服务于本文的理论论证。它们并非作者独立采集的一手田野调查数据，部分场景细节为凸显机制逻辑而进行了必要的抽象与典型化合并。读者应将此部分视作机制展示性质的例示材料，而非经过系统实证检验的经验证据。对经验检验有严格要求的读者，可参见第七部分给出的证伪条件与操作化路径。
- [8] 这里给出的证伪路径，设计原则是使它不是一个无法被检验的免疫策略。它不要求找到一个“完全没有形式”的城市——那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型。它要求的是：在控制了租金和就业这两个最强替代解释变量之后，观察本文的“共同承载强度”与“形式生成”是否对城市的抗衰败表现具有独立的、显著的预测力。如果它们的效应完全被租金和就业所吸收，则本文的核心判断失效。这种设计使理论暴露于可被经验推翻的风险之下，而非让它成为一套无懈可击的修辞。

参考文献

- Altman, Irwin, and Setha M. Low, eds. *Place Attachment*.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2.
- Clark, Terry Nichols, ed. *Can Tocqueville Karaoke? Global Contras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Arts and Development*. Bingley: Emerald, 2014.
- Glaeser, Edward. *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 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 Jacobs, Jane.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Anthropos, 1974).
- Meerow, Sara, Joshua P. Newell, and Melissa Stults. “Defining Urban Resilience: A Review.”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47 (2016): 38–49.
- Mumford, Lewis.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1.
- Relph, Edward.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 Sen, Amarty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 Silver, Daniel, and Terry Nichols Clark. *Scenescapes: How Qualities of Place Shape Soci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 Zukin, Sharon.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本次发表前补入（对应附论一各节，均为真实文献）：
- Oldenburg, Ray. *The Great Good Place*.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9.
- Putnam, Robert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 Granovetter, Mark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no. 6 (1973): 1360–80.
- Florida, Richard.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关于本文创新智商标注

本文的盲评分为 **132**（评分者未参与本文写作，具备评分资格）。附论一与附论二由编辑部补写，补写后的 **136** 是**修改设计目标**，不是认证分——按本栏规程，任何人不得为自己参与撰写的文本出具认证分。该分数**待独立复核**。评分口径为 SDE 创新智商五维（S 结构精确度／D 差异锐度／E 纠缠深度／I 不可还原性／F 可证伪性），参照语料与评分截至日随复核一并公布。